

中华

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1994-2014)

6版

2014年7月9日

[寄语]

编辑:陈香

博览人间好书
弘扬中华文明
李朋义

好人好报
风平心静

创新发展
再接再厉

书业助推
读者津梁

为读者人办报,促全民阅读
——贺《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

——贺《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
黄书元

推动全民阅读

——《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纪念

陈昕
甲午年夏

为读书人找好书
为出版人搭平台

林鹏

童健

《中华读书报》是沟通少儿出版界与作家、教师、学者、阅读推广人的一座金桥。

创刊廿载,铸就辉煌,《中华读书报》
引领高品质阅读,成就卓越影响力。
贺《中华读书报》二十周年,祝《中华读书报》
越办越好。

王亚非

“中华”为读书,读书为中华

贺《中华读书报》二十周年

李学谦

李仲华
2010年6月

读者的天堂
学者的论坛
出版者的展
场

廿年倡导读书,甘泉如缕滋学子;
廿年勤奋耕耘,一帜独树领风骚。
祝《中华读书报》创办二十周年!

于殿利

周百义
2014年6月24日

甲午暑月 徐俊

祝《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
阅读风向标
书业助推器

筑梦中华
读书报国

中国新闻出版社
魏玉山
2014.7.2

王亚非
2014年7月2日

本版题词(以姓名音序排列):

李仲华(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人民邮电出版社社长)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社长) 海飞(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委员前主任) 李朋义(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李学谦(版协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林鹏(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昕(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童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总裁) 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 王亚非(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时代出版传媒董事长) 魏玉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周百义(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

来过中华读书报的“苏联孩子”小谢廖沙

(上接第5版)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

冯雪峰从延安到上海,是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因此他关于岸英兄弟赴苏过程的回忆很重要。

为了解读清楚冯雪峰的叙述,我们先谈一下潘汉年。

关于潘汉年。潘本人没有自述和回忆谈到参与营救毛岸英兄弟。他人的叙述,主要有毛新宇曾经谈到,是毛泽民和钱之光将打听毛三个孩子下落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毛新宇所谈的相关时间比较模糊。多位研究者已经论证,潘汉年1935年秋冬不在上海,1936年营救毛氏

兄弟的几个关键月份,潘也不在上海,而是在香港。1936年6月(时岸英兄弟赴苏事情均已办妥,轮船即将起锚或已经起锚),冯雪峰前往香港和潘汉年会面,冯向潘谈到营救之事。为此,潘汉年专门以密码信件写给莫斯科王明:“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柏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其中1937应为1936,系原信笔误或印刷错误——作者注)

这里,出了一个类似小笑话的历史误会:“一个女共产党员”。经查,李杜将军带领岸英兄弟出发一行九人中,无一女性。这里显然将党组织派的一路照护毛氏兄弟的杨承芳先生弄错了(杨承芳是先生,不是女士,他的故事本处不展开了)。可以看出,潘汉年没有参加在上海的营救,不知详情。这里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冯雪峰自述,冯谈到杨承芳,主要有三点,第一点谈杨的(组织)关系。第二点是主席

两个孩子是冯交给杨带到巴黎的。第三点谈到杨承芳从巴黎回来,冯雪峰见到他。

关于第三点,这已经是1937年初,距冯雪峰、潘汉年香港会面已经半年后。可以看出半年前的冯潘见面时,冯雪峰谈到的是交给了杨任务,但还没见过杨,只是听了另有人汇报事情轮廓,才误将杨错以为女性,并告诉潘。看起来二人认为既然一路照护孩子,那么这样的名字有可能是女性。潘又误汇报给了王明。好在这个无关党史大局的小插曲。但这说明,冯雪峰的叙述有些蹊跷,有一些文字背后没有说出的东西。

冯雪峰的叙述,写于文革逆境中。自身现实的复杂环境和历史的复杂环境,怀有警惕和特定避讳心态是正常的。使得这段自述显得有些支离破碎。这段叙述里,蹊跷和隐晦的是些什么呢?

比如,叙述中,说董几次谈到当时特科和中央局的重要领导人(即董健吾和老金的领导)情况,这些领导人都在董家住过,并且以后(注意,是以后)去了外国。但冯都不知道名字或记不清了。隐冯如董述说的代号胖子等。再有,李杜将军的(党的)关系是谁转给他的,记不清了。再有,李杜、杨承

芳在巴黎没去成莫斯科,又回到上海见到冯。杨承芳向冯说康生不信任李杜,但没有解释康生为什么也不信任杨承芳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以致一行九人(冯叙述中也没有提到)只有岸英兄弟赴苏,其他7人被拒。

冯叙述中清楚谈到的是,主席的两个孩子在董家是事实,没有提到孩子流浪和由他找到。冯给过董一些钱,但说明是因董家困难欠了房租等,没提到毛氏兄弟所需的较大额旅费,更没提到张学良资助。还有,岸英兄弟成行的日期,冯记成了当年5月,和他在香港告诉潘汉年的6月底,相差了一个月。以及其他。

可以看出,如果不显现叙述中的隐晦部分,冯雪峰只知道毛岸英兄弟被特科营救成功赴苏的事情轮廓,不知道详情。那就可以肯定,冯也不是营救岸英兄弟的当事人。那么,冯避讳的是些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从董健吾说起。

3.牧师党员董健吾和一个谜底

“神秘牧师”董健吾,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早期即加入中央特科,在特科期间,传递情报,诛杀叛

徒,护送重要领导人,保卫重要会议等等,可谓功勋累累。考察他的革命生涯,可知在1937年后有过一次断裂,或是大的马鞍型曲折。解放以后,又因潘汉年案件牵连入狱,与潘案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很快又被放出,显然因为他并没有涉及潘案。关于他生涯的后期事,我们同样不展开,围绕本处主题谈,董健吾革命生涯最突出的重要贡献,都在1936年,一是受党组织委托,从上海前往瓦窑堡,沟通了失联多年的国共两党有可能重新合作的信息。二是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还有一件即是救助毛岸英兄弟赴苏。毛泽东主席本人是在1960年某次谈及,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陕北送信那个人就是照护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并说党内有两个怪人,一是和尚许世友,一是牧师董健吾,都要请他们出山(此段话尚需再证实,因为党员牧师不止董一人,董在入党介绍人潘化人就是比董资格还老的牧师)。

毛岸英兄弟从大同幼稚园疏

散至董健吾家到赴苏联,约为四年多时间。多年以后,围绕着毛小兄弟在董家疑似受到虐待,以致长期外出流浪,董家后人与其他相关人员有过一次诉讼。为此中央相关部门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是否定的。这和本文作者的考察是一致的,最主要的证据,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苏联档案中发现的毛岸英自己填写的履历等相关资料,证实毛兄弟在上海没有长时间流浪(也证实了流浪中找回的说法不确实)。

救助岸英兄弟赴苏,董健吾文革逆境中有过“交代”,其后人也出书有特别记载。所叙述的,主要是董在1936年2月往陕北送国民党高层致中共高层的信件时,偶然情况下(在西安被雨雪阻路等)找到张学良将军求助,谈的较好,张将军用飞机将他另一个信使张子华送入红军区域。由此,董结识了张将军。又在偶然的情况下,张将军答应资助董自己的一个孩子和董抚养的两个孩子三人一同赴苏联学习。最后,1936年4月在上海,张将军兑现承诺资助十万法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与毛岸英兄弟一起,三个孩子赴苏成行。不过,董寿琪在巴黎同样被康生所拒,没到成莫斯科,又返回了上海。

(下转第7版)